

# 太仓樊村泾元代遗存与海上丝绸之路关系的 几点思考

吴 敬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上海, 200433)

樊村泾遗址位于江苏省太仓市城厢镇樊泾村小区西侧的上海西路以北、致和塘以南区域。2016~2017年,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在这一区域探明了一处分布范围3万平方米的遗址, 经过2年的发掘, 揭露了1.3万平方米, 发现了仓储址、居住址、道路桥梁基址、河道驳岸等遗迹和以龙泉青瓷为主的遗物<sup>[1]</sup>。随后, 发掘者对樊村泾遗址发现及发掘的意义进行了初步总结, 指出该遗址是一处有直接考古证据的元代码头及仓储遗址, 是元代江南地区经营的一处瓷器贸易集散地, 该遗址的考古发掘从实物角度证明了太仓是元明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之一, 是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之一, 不仅是江南地区元代考古和太仓城市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填补了太仓地区元代海外贸易相关遗存的空白<sup>[2]</sup>。

太仓地区位于长江入海口南岸, 其崛起得益于元代初年由刘家港始发的漕粮海运, “元至元十九年, 宣慰使朱清、张瑄, 自崇明徙居太仓, 创开海道漕运, 而海外诸番因得于此交通市易, 是以四关居民, 阊阖相接, 粮艘海舶, 蛮商夷贾, 辐凑而云集, 当时谓之六国码头”<sup>[3]</sup>。始于元代的漕粮海运一直持续到明初, “我朝洪武三十年, 海运粮七十万石, 给辽东军饷。永乐初, 海运粮七十万石至北京。至(永乐)十三年, 会通河通利, 始罢海运”<sup>[4]</sup>。而且, 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下西洋亦是从太仓刘家港起锚始发, “(郑)和等自永乐初奉使诸番, 今经七次。每统领官兵数万人, 海船百余艘, 自太仓开洋”<sup>[5]</sup>。从文献记载来看, 太仓毫无疑问是元代至明代早期东南沿海地区的重要港口城市和海上丝绸之路起始港之一。也许正是由于太仓有着辉煌的港口发展史, 樊村泾遗址以其兼有仓储、生活、码头、驳运等遗迹, 尤其还出土了150余吨的龙泉青瓷, 很自然地与海外贸易联系到一起。但是, 仅仅由此便将樊村泾遗址及其出土瓷器作为太仓海上丝绸之路起始港及海陆丝路交会点的力证, 在笔者看来似有一些值得思考之处。

## 一、与元代市舶历史背景的关系

据发掘者介绍,樊村泾遗址出土龙泉青瓷的时代集中于元代中晚期。南宋至元代是龙泉窑的鼎盛时期,龙泉青瓷也是当时外销的主要货品之一。据文献记载,太仓刘家港行漕粮海运后,番商纷至沓来,樊村泾遗址出土数量如此之多的龙泉青瓷,外销的确是一个较为贴切的解释。那么,樊村泾遗址出土的这批龙泉青瓷,是否真的以外销为主呢?如果樊村泾遗址出土的龙泉青瓷主要用于外销,不是全无可能,但如果将这一推论和当时的时代背景作对应分析,似有一些可商之处。

首先,樊村泾遗址缺乏元代早期龙泉青瓷的佐证。

元代漕粮海运试行于至元十九年(1282年),于至元三十年(1293年)开创了最为便捷的海道,从此“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十年间海运漕粮的数额从最初的四万六千余石增长到高峰时的一百五十多万石<sup>[6]</sup>。这一阶段应是太仓奠定漕粮海运始发港地位以及海上贸易活动兴起的重要时期。南宋时期,龙泉青瓷已是备受海外市场青睐的货品,元代必然延续了龙泉青瓷外销的这一势头。若以文献所载,太仓在漕粮海运兴起之后带来了繁荣的市舶活动,当有这一时期遗物的留存。但以目前报道的资料而言,遗址缺乏元代早期遗存,尚不足以支撑这一推论。抑或是元代早期太仓的海外贸易,仍处在萌芽阶段,尚未形成全方位的市场规模。

其次,龙泉青瓷如果于元代中期大量运至太仓再外销,与同时期或稍早阶段的政府管理态势不太相符。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设市舶都转运司于杭、泉二州,官具船给本,选人入蕃,贸易诸货。……凡权势之家,皆不得用己钱入蕃为贾,犯者罪之,仍籍其家产之半。二十三年(1286年),禁海外博易者,毋用铜钱。二十五年(1288年),又禁广州官民,毋得运米至占城诸蕃出棗”,虽然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成宗继位后“诏有司勿拘海舶,听其自便”,但是在管理上依然没有松懈,“元贞元年(1295年),以舶船至岸,隐漏物货者多,命就海中逆而阅之”,此后的延祐元年(1314年),政府又重申“仍禁人下蕃,官自发船贸易”,直到元代中期的至治三年(1323年),才完全放开私人海外贸易,“听海商贸易,归征其税”<sup>[7]</sup>。此外,元代早期,政府曾在“杭州、上海、澈浦、温州、庆元、广东、泉州置市舶司凡七所”<sup>[8]</sup>,但至元三十年(1293年)“温州市舶司并入庆元,杭州市舶司并入税务”、大德二年(1298年)“并澈浦、上海入庆元市舶提举司,直隶中书省”<sup>[9]</sup>。

文献所载的这些元代早期或稍晚之事,或多或少都透露出,元代早中期的海外贸易虽然频繁,但是政府对其管理是较为谨慎的,且趋于集中。而在太仓地区,朱清、张瑄及其家族常年掌控着元代漕粮海运的经济命脉和本区域的海外贸易。最终,在元朝政府高层的格外关注下引发了猜忌,大德七年(1303年)“僧祖芋讦二人有逆谋,枢密院

断事官曹拾得从中主之。诏籍其家，逮清、瑄至京师。……（清）以首触石而死。……瑄与子文虎，清子虎，俱弃市”<sup>[10]</sup>。朱清、张瑄及其家族的陨落，对于太仓的海外贸易应是一个不小的冲击。当元代早期朱清、张瑄显赫之时，尚未发现在太仓有外销迹象的龙泉青瓷，却在元代中后期大量出现在樊村泾遗址，这不得不耐人寻味。

## 二、与新安沉船出土瓷器的关系

据发掘者的初步研究，樊村泾遗址出土的龙泉青瓷与韩国新安沉船出水遗物高度相似，因此认为其中有相当部分会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外销。与此同时，发掘者也提及这些龙泉青瓷运至太仓后或会供应大都，进而转运中亚、西亚等地。这一认识可谓较为周全，既突出了太仓在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的地位，同时也没有否认其他的可能性。文献中对元代至明代早期太仓地区海事活动的记载较为丰富，因此太仓作为元明时期海上丝路起始港毋庸置疑。但是，以新安沉船及其出水龙泉青瓷为比照对象，能否作为确认太仓海上丝绸之路历史地位的直接考古证据呢？是否以此就能说明太仓是海陆丝路的交汇点呢？在笔者看来，这些说法须谨慎对待。

一者，从所处位置来看，太仓若作为龙泉青瓷海运外销的始发港，其与闽浙沿海诸港相比，似无优势可言。

据研究，龙泉窑产品运达临近海港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从窑场出发顺龙泉溪沿瓯江抵达温州；二是从窑场出发向南由陆路进入福建北部，再沿闽江上游支流进入闽江干流后抵达福州<sup>[11]</sup>。一般认为，温州、庆元和泉州是宋元时期龙泉青瓷外销的主要始发港<sup>[12]</sup>。温州市舶司被撤并后，其港口功能应不会尽弃。福州在元代虽未设置市舶司，但是在关于元代市舶活动的文献中，福州却常与泉州一并提及<sup>[13]</sup>，其也应是当时重要的沿海港口。

从前文分析可知，以元代早中期的政府管理态势，原先需要在温州办理的外贸手续应会转向其他市舶司所在地，而由福州始发的外贸货物也应转运至市舶港或驶往市舶司所在地办理出口官凭。太仓曾于至正二年（1342年）设立庆元市舶分司<sup>[14]</sup>，即便要前往太仓办理市舶手续，那也应当在此之后。但是，从温州或福州出发，无论是去庆元还是泉州，都比太仓近便许多。来自南洋的番商应该不会舍近求远越过泉州、庆元，而专程去太仓市易龙泉青瓷。

如果说樊村泾遗址出土龙泉青瓷可能有一部分用于海运外销，那最有可能是高丽或日本，因为太仓地处闽浙以北的长江入海口，往来船舶可能会首先抵达太仓。但若以韩国新安沉船为例，同样是元代中后期，龙泉青瓷1.2万余件，占有出水瓷器的60%以上<sup>[15]</sup>，对于其始发港，有学者提出是庆元<sup>[16]</sup>，也有学者认为是福州<sup>[17]</sup>，与太仓并无直接关系。以此为证说明樊村泾遗址出土龙泉青瓷主要用于海运外销，似有“拖后腿”之嫌。

再者,从考古发现上看,樊村泾遗址出土龙泉青瓷与新安沉船出水瓷器即便相似度较高,也很难作为其主要用于海运外销的直接证据,而太仓作为海陆丝路交汇点的说法也稍显牵强。

冯先铭先生早已指出,“在江西景德镇和浙江的龙泉这两个大产瓷区,则是一方面为外销,一方面为内销;它们既满足国外市场的需要,也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sup>[18]</sup>。如果宋金对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龙泉青瓷在北方乃至更远地区的销路,那么元代的大一统,则完全打通了南方地区至中原地区以及内亚至东欧地区的政权阻隔。在元王朝的北部直管领土及其附属汗国的内陆区域,例如中国的东北地区<sup>[19]</sup>、北方长城地带<sup>[20]</sup>和新疆地区<sup>[21]</sup>,以及现今的蒙古国<sup>[22]</sup>和东欧的俄罗斯、乌克兰境内<sup>[23]</sup>,都有元代龙泉青瓷的身影。此时的陆上丝绸之路与汉唐时期相比,到达区域或许更远了,也起到了经济文化纽带的作用,但其性质似乎更倾向于宗主国和附属国之间的陆上交通线。

如果说樊村泾遗址出土龙泉青瓷与新安沉船出土者高度相似,便推断其主要用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外销,那么在内蒙古的集宁路古城和元上都、北京的元大都,以及蒙古国的哈拉和林、俄罗斯诺夫哥罗德的克里姆林宫等遗址,都有与樊村泾遗址出土龙泉青瓷高度相似者,似乎也可以提出另一种不同的认识。而且,樊村泾遗址出土的龙泉青瓷上,许多器物底部有汉字或八思巴文,其中的一些汉字,诸如“刘宅”“方宅”“仲夫”“金提领·项七官人”等,多为当时本土用瓷常见<sup>[24]</sup>。在樊村泾遗址出土的卵白瓷中,还有“枢府”款瓷器。这些现象似乎都在暗示,樊村泾遗址出土的南方瓷窑产品,更有可能是销往大都或是中原北方的其他地区。

如果这一推论成立,龙泉青瓷从产地经太仓转运至中原北方地区,或者进而输往内亚和东欧地区,将这一过程称为国内货物的江海联运路线似乎更为合适,而将太仓定义为海陆丝路交会点,则略显夸大。若定要有此一说,则也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海外番商或国内海商将货品贩至太仓后,必然会进行再分配,届时可能会有一些珍货通过皇帝赏赐或民间贩卖输往元朝的西域属国。但是,陆路运输耗时费事不说,且运量有限,即便有所赏赐或贩卖,数量也必然不会太多。因此,在肯定太仓丝路贸易港地位的前提下,仅凭樊村泾遗址出土龙泉青瓷及其和新安沉船出水瓷器的相似,很难将其作为太仓海上丝路起始港和海陆丝路交会点的最有力考古证据。或者说,即便以此为据,也不足以如此彰显太仓在海上丝路贸易中的地位。

### 三、国内转运和海外贸易的关系

刘家港开创漕粮海运之后,太仓逐渐成为新兴的海外贸易港,庆元市舶分司的增设(1342年),应是政府对太仓市舶活动给予的认可。那么,在太仓进行的漕粮海运和海外贸易,是轻重有别还是并驾齐驱呢?从文献记载以及一些考古发现看来,也可以作进一步的讨论。

首先，可以讨论一下元代刘家港的海事活动。

刘家港实为太湖东北部宣泄水道娄江的下游河段浏河，最晚在8世纪，太湖娄江水道已经淤废，但北宋至和年间吴郡（今苏州市区）以东娄江昆山塘的成功疏浚，使娄江又成了太湖泄水的重要水道，至13世纪末形成了水面宽阔的浏河<sup>[25]</sup>。至此，刘家港不仅坐拥长江干流入海口的有利位置，而且还通过娄江与江南运河及太湖水系联系在了一起。这为太仓成为元代南粮北运和漕粮海运江南中转站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运粮海船曾一度“万艘如云，毕集海滨之刘家港”<sup>[26]</sup>。

文献的记载可能会有夸张，但从延祐元年（1314年）漕粮海运的发船数额来看，“浙西平江路刘家港开洋一千六百五十三只，浙东庆元路烈港开洋一百四十七只”<sup>[27]</sup>，刘家港每年的海漕事务应占据了港口的绝对份额。而且，这还是皇庆元年（1312年）将浙东和福建沿海地区漕粮改为庆元起运之后的数额，“请庆元地居东南，既于本处装讫粮米，再入刘家港取齐，多有沙险去处，若就定海港口放洋，径赴直沽交卸，实为便益”<sup>[28]</sup>。刘家港漕粮海运规模之大可想而知，试问留给海外贸易的空间还有多大呢？浙东沿海地区的粮食既已从庆元起运，唯利是图的商人还会将龙泉青瓷运去刘家港外销吗？果真如此的话，那徒增的舟车之费一目了然。而且，设若刘家港在开通漕粮海运之后真是番商云集，政府也不至于在六十年后才设立庆元市舶分司。“六国码头”之说或许指的就是不超过十个国家也未可知，所谓的“市舶物多横道路”无论如何也无法与“漕运开洋鼓乱挝”<sup>[29]</sup>相提并论。因此，太仓在元代中期前后可能是海外贸易的一个新兴亮点，但就外贸份额、政策扶持等方面而言，与庆元、泉州等国际大港应有着不小的差距，此时其海上丝绸之路起始港的地位似不宜过度夸大。

其次，再来关注一下船舶装载的问题。

由于航行经验的积累和造船技术的进步，到了元代，船舶对航行区域水文条件的要求是比较高的<sup>[30]</sup>。所以，当朱清、张瑄首行漕粮海运之时，为适应近海航行的水域条件，“造平底海船六十艘”，共计运粮四万六千余石<sup>[31]</sup>。到了开通深海航线后的延祐年间（1314~1320年），所造漕运海船已是“大者八九千，小者二千余石”<sup>[32]</sup>。

从中国海域不断发现的宋元时期沉船来看，多为当时国内所造。而且据研究，南宋时期活跃于印度洋东部海域的商船，已主要为当时中国的大型海船，如要前往大食（阿拉伯地区），便在印度半岛南端换乘小型的阿拉伯商船，而当时日本海船的构造也十分一般<sup>[33]</sup>。由此推想，蛮商夷贾即便“辐辏云集”于太仓，可能也多数不会使用本国货船前来贩货，韩国新安沉船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此，即便樊村泾遗址出土龙泉青瓷主要用于海运外销，使用元代本土所造海船的可能性更大。果真如此的话，可能会使用何种海船运走的呢？若以泉州后渚发现的南宋末年沉船为例，该船是一艘保存较为完整的中等远洋海船，据测算其载货量约200吨<sup>[34]</sup>。若以韩国新安沉船为例，该船一次装载的瓷器超过2万件。如果以这些海船的装载量而言，即使是分批运载150吨甚至更多的龙泉青瓷，当不至于遗留如此之多的库存。而且，在目前发现的其他宋元时期港口

遗址中,虽然也会出土多达数吨的瓷器残片,如黄骅海丰镇遗址<sup>[35]</sup>、垦利海北遗址<sup>[36]</sup>,但数量如樊村泾遗址之多者实属罕见,因此其主打外销的认识值得反思。

若这些龙泉青瓷不以海运外销为主,那么最大的可能便是经太仓由水路向北转。从太仓向北的水路转运通道无外乎两条,一是沿漕粮海运的路线北上,二是沿浏河、娄江上溯后沿运河北上。

如果沿漕粮海运路线单独装船,显然也会和前述使用本土海船外销类似,装载量大,料不至于产生较多积压。此外,还有另一种可能,便是在漕船中夹带私货,这种行为在两宋时期便已存在,并被官方所认可,“(南宋建炎)四年七月三十日,户部言准都省批下发运副使宋辉扎子,……(北宋)真州至京,每纲船十只,且以五百料船为率,依条八分装发,留二分揽载私物。如愿将二分力胜加料装粮,听”<sup>[37]</sup>。元代漕粮海运与两宋纲运,均为政府主导,虽然不能确定元代会延续两宋时期的做法,但漕粮海运的实际操作者主要是朱清、张瑄这样的地方豪强富户,在利益的驱使下,或多或少会有夹带私货的情况发生。因此,在运量、运时都不确定的情况下,产生货物积压的可能性便大大提升。而且,在漕粮海运可能途经的沿海港口,如胶州板桥镇遗址<sup>[38]</sup>、黄骅海丰镇遗址<sup>[39]</sup>,也发现了元代龙泉青瓷的踪迹,但数量又都不多,这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这条瓷器北运路线在当时所发挥的作用。

如果沿运河北上,又是何种情况呢?元代开创漕粮海运之初,由于海道艰难,“每岁令江淮漕运司运粮至中滦,中滦漕运司接粮至大都。……未几,又分新河军士水手及船,于扬州、平滦两处运粮,命三省造船三千艘于济州河运粮”<sup>[40]</sup>。虽然漕粮海运很快开创了旬日抵京的便捷海道,但是元政府也十分重视运河漕运,在对运河原有河道不断疏浚的同时,为贯通大运河全线,还兴修了很多新河道<sup>[41]</sup>。但是,运河漕船的装载量显然远不如海船,以山东菏泽元代运河沉船为例,据测算,该船的净载货量不超过25吨<sup>[42]</sup>,时间一长,货品可能就会产生一定数量的积压。倘若运河漕运也存在不定时、不定量的夹带行为,那么瓷器作为漕运路线上的非主要货品,积压量便会更大。

此外,还有一种可能便是经太仓中转后溯江而上。据文献记载,元朝政府曾于至大年间(1308~1311年)令“湖广、江西之粮运至真州(今江苏仪征)泊入海船”再行海运,但由于大型海船的尖底构造不适合入江航行,最终下定决心由刘家港完全承运江南粮赋,“海漕之利,盖至是博矣”<sup>[43]</sup>。那么,运送漕粮的船舶在返回时,是否会捎带一些龙泉青瓷呢?毕竟龙泉窑地处浙西南山区,陆路外运多有不便,且当时的陆路运费较水运要高不少<sup>[44]</sup>,不排除运粮船会利用这一契机贩回一些已存储于太仓的龙泉青瓷。

因此,太仓在元代的海港体系中,可能主要还是扮演了国内转运的角色,樊村泾遗址出土龙泉青瓷,也并非主要用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外销。

## 四、余 论

通过上文的讨论，我们对太仓樊村泾遗址的性质，尤其是遗址中出土150余吨龙泉青瓷的去向，得出了一些不同的认识。如果这些可能确实存在的话，这批龙泉青瓷又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在太仓的呢？

据介绍，樊村泾遗址出土龙泉青瓷的年代主要集中于元代中后期，而从前文分析可知，这批龙泉青瓷运抵太仓，其主要目的可能不是海运外销，而是利用刘家港的漕运枢纽继续转运。至元三十年（1293年），当漕粮海运开创旬日抵京的航线之际，也恰是温州市舶司并入庆元之时。原先可能要从温州大量外销的龙泉青瓷，除了转运庆元、泉州以外，可能也需要拓展其他的销路。而正是从元代中期开始，樊村泾遗址的龙泉青瓷开始大量出现，也许这是巧合，但也许就是龙泉青瓷经温州运至刘家港后再转销的新路线。而且在延祐年间（1314~1320年）以前，温州也曾有去往太仓的运粮船，“粮之登舟，自温台，上至福建，凡二十余处，皆取客舟载之至浙西”<sup>[45]</sup>。当这些漕粮改从庆元海运后，也许还会有一些商户仍然从事温州至太仓的货运航线，这可能便是樊村泾遗址龙泉青瓷较有可能的来路之一。而遗址中出土的南平茶洋窑、晋江磁灶窑、福清东张窑、闽清义窑、莆田庄边窑等福建瓷窑产品，可能也是随着福建地区的运粮航线抵达太仓。但是，这些以外销为主的瓷窑产品在樊村泾遗址中出土数量不多，它们地近泉州、福州，可以就近开洋外运。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太仓在元末的情况。太仓在元代南粮北运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海外贸易也红极一时。但是，太仓的庆元市舶分司设置仅十年后，从至正十二年（1352年）开始，方国珍频繁从海上袭击太仓，浙西战事频起<sup>[46]</sup>，相信此时的太仓也已失去了“六国码头”的风采。而且，“太仓城旧木栅，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张士诚据苏州，遣将高智广筑新城”<sup>[47]</sup>。由此可见，至正十七年以前，从长江口入浏河再到樊村泾，无城墙之隔，水路通畅，而遗址所处之地也临近文献所载的仓储之地，“自刘家河至南薰关，筑长堤三十余里，名楼列布”<sup>[48]</sup>。太仓筑城后，位于太仓城内中部偏东区域的樊村泾两岸，显然已不适合继续作为转运仓储之地。虽然张士诚、方国珍在降元后，还曾一度往大都海运粮食，但是始发港已改在激浦，且最多时也仅有一年十余万石<sup>[49]</sup>。因此，这些龙泉青瓷也不太可能会是这一时期运来太仓的。

综上所述，元代刘家港的漕粮海运盛极一时，海上丝绸之路港口的地位也毋庸置疑。但本文的讨论，主要是基于目前初步公布的考古资料，所涉内容难免会存在一些局限。而对于樊村泾遗址及出土龙泉青瓷性质的进一步认定，还有待于更多材料的公布。

## 注 释

- [ 1 ]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 太仓市博物馆. 大元瓷仓重现太仓 海丝申遗又添新证——太仓樊村泾元代遗址重大考古收获 [ N ]. 中国文物报, 2017-12-15 ( 6 ).
- [ 2 ]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 太仓市博物馆. 大元·仓——太仓樊村泾元代遗址出土瓷器精粹 [ M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 下文中凡提及发掘者的相关认识, 均来自于该书 )
- [ 3 ] ( 明 ) 桑悦纂, ( 清 ) 缪朝荃校勘. ( 弘治 ) 太仓州志 [ M ]. 清宣统元年汇刻太仓旧志五种本, 卷一·沿革.
- [ 4 ] ( 明 ) 邱濬. 大学衍义补 [ M ]. 台北: 商务印书馆,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986, 卷三十四·漕挽之宜 ( 下 ).
- [ 5 ] ( 明 ) 张寅纂. ( 嘉靖 ) 太仓州志 [ M ]. 上海: 上海书店,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据崇祯二年重刻本影印, 1990, 卷十·杂志.
- [ 6 ] ( 明 ) 宋濂. 元史 [ 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卷九十三·食货一·海运.
- [ 7 ] 同 [ 6 ], 卷九十四·食货二·市舶.
- [ 8 ] 同 [ 6 ], 卷十七·世祖十四.
- [ 9 ] 同 [ 7 ].
- [ 10 ] 柯劭忞. 新元史 [ M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卷一八二·朱清张瑄传.
- [ 11 ] [ 日 ] 森达也. 宋元外销瓷的窑口与输出港口 [ J ]. 考古与文物, 2016 ( 6 ).
- [ 12 ] 叶文程, 芮国耀. 宋元时期龙泉青瓷的外销及其有关问题的探讨 [ J ]. 海交史研究, 1987 ( 2 ).
- [ 13 ] 同 [ 7 ].
- [ 14 ] 高琪. 太仓南郊元明海运仓遗址及相关航海古迹史实初探 [ C ]. 明史研究论丛 ( 第十辑 ). 北京: 故宫出版社, 2012.
- [ 15 ] [ 韩 ] 高美京. 新安船出水陶瓷器研究述论 [ J ].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3 ( 5 ).
- [ 16 ] [ 日 ] 三上次男著, 王晴堂译. 新安海底的元代宝船及其沉没年代 [ J ]. 东南文化, 1986 ( 2 ).
- [ 17 ] 席龙飞. 对韩国新安海底沉船的研究 [ J ]. 海交史研究, 1994 ( 2 ).
- [ 18 ] 冯先铭. 中国古代外销瓷的问题 [ J ]. 海交史研究, 1980 ( 总 2 ).
- [ 19 ] 秦晓杰, 彭善国. 东北地区出土元代瓷器初探 [ J ]. 内蒙古文物考古, 2010 ( 2 ).
- [ 20 ] a. 宋蓉. 北京地区元代瓷器发现与研究述评 [ J ]. 文物春秋, 2014 ( 4 ).  
b. 彭善国. 内蒙古地区出土的元代瓷器及相关问题 [ J ]. 内蒙古社会科学 ( 汉文版 ), 2006 ( 2 ).
- [ 21 ] 牟新慧. 新疆博物馆馆藏的几件元代龙泉窑瓷器分析 [ J ]. 新疆艺术学院学报, 2010 ( 1 ).
- [ 22 ] [ 苏 ] C. B. 吉谢列夫等著, 孙危译. 古代蒙古城市 [ M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 [ 23 ] 张涵. 蒙古四大汗国发现的元代龙泉窑瓷器 [ J ]. 收藏家, 2019 ( 7 ).



- [24]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瓷器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4. 该遗址出土的窖藏瓷器中, 有的青白瓷盘底部墨书“窰”, 有的卵白釉碗底部墨书“王宅药铺”“药”, 有的龙泉青瓷盘底部墨书“马”“张”, 有的钧瓷碗底墨书“申家”“冯一山”。
- [25] 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 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2.
- [26] 元海运志·附录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27] (元)赵世延, 揭傒斯等纂, (清)胡敬辑. 大元海运记·卷下 [M]. 台北: 广文书局, 1972.
- [28] 同 [27].
- [29] (元)谢应芳. 龟巢稿 [M]. 台北: 商务印书馆,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986, 卷二·过太仓, 该诗全文为“杨柳溪边系客槎, 桃花雨后柳吹花。东南地角环沧海, 日夜潮声走白沙。市舶物多横道路, 江瑶价重压鱼虾。天妃庙下沉玄璧, 漕运开洋鼓乱挝”。
- [30] 杨熺. 承前启后的元代船舶 [J]. 大连海运学院学报, 1983 (增刊)。
- [31] 同 [6].
- [32] 同 [26].
- [33] 汶江. 论我国古代航海和造船技术的成就——兼评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J]. 海交史研究, 1984 (总6)。
- [34] 庄为玠, 庄景辉. 泉州宋船结构的历史分析 [J].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77 (4)。
- [35] 黄骅市博物馆,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2000年黄骅市海丰镇遗址发掘报告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5.
- [36]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文化遗产研究院, 垦利区博物馆. 丝路之光——垦利海北遗址考古与文物精粹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
- [37] (清)徐松辑. 宋会要辑稿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7, 食货·四七.
- [38] 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 胶州板桥镇遗址文物考古图集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4, 第86页青釉蔗段洗、第99页青釉贴花双鱼纹盘, 为典型的元代龙泉青瓷。
- [39]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黄骅市博物馆. 华瓷吉彩——黄骅海丰镇遗址出土文物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 第81页青瓷高足杯和蔗段洗, 为典型的元代龙泉青瓷。
- [40] 同 [6].
- [41] 秦新林. 试论元代南北大运河的兴修 [J]. 殷都学刊, 1984 (4)。
- [42] 龚昌奇, 张启龙, 席龙飞. 山东菏泽元代古船的测绘与研究 [C]. 航海: 文明之迹.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 [43] 同 [6].

- [44] (宋)沈括撰,施适点校.梦溪笔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卷十一·官政一,“运盐之法,凡行百里,陆运斤四钱,船运近一钱,以此为率”.
- [45] (元)虞集.道园学古录[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2006,卷四十一·昭毅大将军平江路总管府达鲁噶齐兼管内劝农事辉图公墓碑.
- [46] 陈忠平.刘河镇及其港口海运贸易的兴衰[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3).
- [47] (明)张采纂.(崇祯)太仓州志[M].明崇祯十五年刻本,卷二·城池.
- [48] 王祖畬等纂.(民国)太仓州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中国方志丛书据民国八年刊本影印,1975,卷十七·顾观.
- [49] 沈福伟.苏州刘家港的历史变迁[J].海交史研究,1988(1).

## Some Though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mains of Fancunjing Site of Yuan Dynasty and the Maritime Silk Road

WU Jing

During 2016 and 2017, Fancunjing Site was discovered in Taicang City, Jiangsu Province, which had tons of Longquan Celadons. The excavator proposed that Fancunjing Site was an important foreign trade port in Yuan Dynasty. But after in-depth analysis, we find it is questionable. And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these evidence, we believe that the function of domestic transshipment of Fancunjing Site may be more important than foreign trade.